

北京市一九五〇年暑期教師學習講座專輯

歷史教學講座

北京市中小學教職員學習委員會編

大眾出版社

C70

6

10

歷史教學講座

(修訂本)

北京市中小學教職員學習委員會編

大眾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本書收集有三篇關於歷史問題的講稿，都是各作者在北京市一九五〇年中等學校歷史科暑期學習會上講過的。這些文章分別談到了研究歷史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和如何處理歷史人物以及中國歷史上的民族戰爭問題。在歷史教師的教學和一般人對歷史的認識上給了一些基本的知識。

歷 史 教 學 講 座

北京市中小學教職員學習委員會編

書號：1005（發） 定價 1,600元

32開本 56定價頁 25,000字

1961年1月第一版 1953年5月第一次印刷

1954年1月第二次印刷（40001—55000冊）

大 衆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西四區白塔寺顯香巷四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字第十九號

北京日報印刷廠排

北京市印刷三廠印

重版聲明

北京市一九五〇年暑期教師學習講座專輯中的九種講座，出版後早已售完；但各地中學教師同志仍不斷來函洽購。爲滿足同志們的需要，特將「歷史教學講座」交大眾出版社重排出版。

目前我們尚無力量將本書改編，充實，使其真正符合同志們在教學上的需要，僅請原講演人做了一些修訂，仍用原書名出版。

北京市中小學教職員學習委員會

一九五三年五月

AK15/05

目 錄

怎樣研究中國歷史·····	翦伯贊(一)
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	榮孟源(一五)
中國歷史上的民族戰爭·····	劉桂五(三)

怎樣研究中國歷史

蕭伯贊

怎樣研究中國歷史，這個問題很大，但扼要地說來，就是立場、觀點和方法的問題。

首先說到立場問題，因為這是歷史研究的出發點。

所謂立場，就是一個歷史家站在甚麼階級立場來處理歷史的問題。一般說來，階級社會中的歷史家，總是站在剝削階級的立場，把歷史學當作辯護階級剝削的工具。必要時，甚至歪曲歷史，以引出其所需要的結論。雖然也有些具有正義感的歷史家，他們對剝削階級採取批判的態度，但歸根到底，他們的批判還是要受到階級性的限制。這就說明了超階級的歷史家實際上是不存在的，也說明了站在剝削階級的立場是不能也不願揭示歷史真理的。能夠揭示歷史真理的只有無產階級，因為只有無產階級才能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自己，給與歷史以科學的說明，才能使歷史學與革命的實踐相結合，才能指出歷史發展的規律。

我們可以充分地指出，中國過去的歷史家，最大多數都是站在地主階級的立場替封建主義服務的。貫徹着中國歷史學中的正統主義，就是辯護地主階級的階級分配的一種歷史理論。所謂正統主

義就是以帝王爲中心的歷史主義。照正統主義者看來，所謂歷史，就是一個皇帝加一個皇帝，一個王朝加一個王朝，如果某一王朝被農民顛覆便是歷史中斷，便需要另外一個地主奮起革野，恢復地主階級的統治，存亡繼絕。總之，他們以爲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地主階級的統治，如果有人企圖推翻地主階級的統治，便被指爲「盜」、爲「賊」、爲「匪」、爲「寇」、爲「叛逆」、爲「妖人」，便被當作地主階級的仇敵而遭受剿滅、屠殺。因此他們把每一個爬上了寶座的地主，都頌揚爲神聖，把每一個辯護封建制度的理論家，都頌揚爲人類的師表，把每一個保衛封建制度的武士，都頌揚爲英雄豪傑。此外，他們又運用一種人道主義的言語，把封建社會粉飾爲「王道盛世」。至於他們對於歷代以來被壓迫剝削和奴役的人民羣衆則視若無覩。如果說在古典的歷史著作中也可以看到人民羣衆的紀錄，那除非這種人民可以用爲宣傳封建道德的資料，例如烈女節婦之類，不然就是被當作「叛逆」的典型，用以警戒當代的羣衆。

現在，地主階級的統治，已經最終地從中國歷史上消滅，我們研究中國歷史，就應該站在勞動人民的立場，批判以帝王爲中心的正統主義，建立以勞動人民爲中心的新的中國歷史。我們要從中國歷史上去發現勞動人民的歷史創造，他們的發明與發見，他們反封建制度的革命鬥爭；這就是說，我們要研究勞動人民生產的歷史和革命的歷史。但這不是說，我們就不研究統治階級代表人物的歷史，相反的，我們應該精細地去研究他們的歷史，因爲只有從統治階級的歷史中，才能發掘

出勞動人民的歷史。不過在研究統治階級的歷史時，要站在勞動人民的立場，這就是說，我們要盡量地去揭發地主階級的罪惡，揭發封建社會的黑暗，並且要指出封建社會的暫時性及其滅亡的必然性。自然，我們也要指出封建社會在歷史發展的總行程中，還是有它的進步性；因爲比之奴隸制度，封建制度是一種進步的制度。

封建時代的中國歷史家，不僅用正統主義辯護他們的階級統治，又用火漢族主義來辯護他們的種族支配。他們把漢族描寫爲神明華胄，把其他種族描寫爲犬羊之族、虫豸之裔，好像漢族是天生的文明種族，其他種族是天生的落後種族，從這裏替漢族的地主階級找到了征服其他種族的歷史根據。

從春秋戰國以來，中國的歷史家就產生了「內諸夏而外夷狄」的狹隘的種族主義的思想，他們就強調「華夷之別」，就宣傳一種憎惡隣人的理論，他們說「戎狄豺狼，不可厭也！」（左閔元年）、「戎，禽獸也。」（左襄四年）、「翟，封豕豺狼也。」（國語周語中）、「戎翟，冒沒輕僞，貪而不讓！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國語周語中），像這樣的仇視隣人的說教，充滿了中國的史乘，其目的就是爲了煽動種族之間的仇恨，以便利地主階級發動侵略戰爭。

在漢族歷史家看來，中國的本部是漢族的禁脔，中國境內的其他種族，皆不得入居中原，他們不分青紅皂白，是非曲直，只要蒙古人跑進長城，就是「入寇」；氐羌跑到陝甘，就是「內犯」；

西南少數民族從深山窮谷跑到平地，就是「作亂」。相反的，當漢族的地主階級南征北伐，去進攻他的隣人，去從他的隣人進行武裝的收奪的時候，地主階級的歷史家却說道是宣揚王化。爲了鼓舞這種宣揚王化的事業，漢族的歷史家往往用最動人的言語歌頌那些遠征異域的冒險家，歌頌那些爲了少數地主發財而使千百萬勞動人民成爲泥沙的侵略戰爭，歌頌那種對少數民族之野蠻的刀劍統治。

現在被視少數民族的時代已經成了過去，我們應該批判那種站在狹隘的種族主義立場所寫的大漢族主義的歷史，建立包括中國境內各少數民族的真正的中國歷史。

爲了建立這樣的歷史，我們應該把中國歷史的研究，聯系到漢族以外各少數民族歷史的研究，因爲實際上中國的歷史，不只是漢族的歷史，而是中國境內各族人民的歷史的總和。自然，我們應該承認無論在經濟與文化關係的發展上，或者在反對各種壓迫的鬥爭中，漢族的人民都起了卓越的主導的作用，不承認或不重視漢族在歷史上所發揮的卓越的主導的作用是不對的，但因此而無視或不重視少數民族在歷史上的貢獻也是不對的。因爲不論漢族在歷史的發展中發揮了怎樣的卓越的主導的作用，佔有怎樣重要的地位，也只能是中國史的一個主要的構成部分而不能是中國史的全部。因此，如果不研究各少數民族的歷史，就不可能對中國歷史得出全面的、正確的結論。

在研究漢族與中國境內各少數民族的歷史關係時，當然應該從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各方面的相互關係作全面的考察，這樣，我們除了說到商業交換、文化交流等和平的關係以外，也不得不涉及民族之間的戰爭，這種戰爭往往是帶有侵略的性質，怎樣處理歷史上的民族之間的戰爭問題呢？這就使得許多歷史家遇到了困難。對於處理這個問題，我有一些不成熟的意見。我以爲當我們說到各族統治者所實行的侵略政策和不義戰爭時，首先要明確地指出它的主觀的動機和目的性，譴責侵略戰爭，因爲這可以養成人民羣衆對侵略政策的否定與敵視態度。但僅僅指出戰爭的主觀動機和目的性是不够的，同時也必須根據具體的史實進行分析，指出戰爭所招致的客觀效果，因爲客觀效果與主觀動機往往是不符合的。其次必須把各族人民和各族統治者分別開來，因爲發動侵略、組織侵略的不是各族人民而是各族統治者，這些統治者不僅是被侵略民族的人民的敵人，也是他自己民族的人民的敵人，因爲在侵略戰爭中被損害的不只是被侵略民族的人民，也包括侵略民族的人民在內。最後，我以爲侵略行爲和不義的戰爭是應該受到譴責的，但如果拿今天的民族政策去要求封建社會的統治者——帝王，那就是非歷史主義的。因爲各民族在平等的基礎上建立友好的大家庭，這是毛澤東主席的偉大的民族政策，在過去的任何時代都是不可能的。

其次，說到觀點問題。

所謂觀點問題，就是對歷史的看法或認識問題。一個歷史家對歷史的看法或認識也不是偶然

的，他爲甚麼要這樣看而不那樣看，要這樣認識而不那樣認識，這是被決定於歷史家所屬的階級，因爲一個歷史家對歷史的看法和認識，就是反映這個歷史家對現實世界的需要和願望。換言之，就是歷史家的階級意識在歷史學上的表現。

在階級社會中，由於歷史家的階級屬性不同，在歷史學上也就出現了各種不同的歷史觀。但儘管有各種不同的歷史觀，歸根到底總是貫徹着唯物論與唯心論兩種敵對觀點的鬥爭。

這幾乎是一個決定的事實，只要是站在剝削階級的立場的歷史家，沒有一個不反對唯物論的，他們一聽到唯物論這個名詞，就以爲是大逆不道；反之，對於唯心論則認爲是一種盡善盡美的東西，這樣的情形是不足奇怪的。因爲當剝削階級爲了要保持和鞏固自己的統治的時候，他們的階級利益就會限制他們對歷史的正確認識，就會要求他們蒙蔽歷史的真理，因爲揭發了真理，對於他們的階級支配是一種危害，而唯物論者就正是要真實地認識歷史，要徹底地揭發歷史的真理。

我們可以這樣說，中國古代的歷史家幾乎都是唯心論者，他們寫著歷史的動機，就是爲了發揮主觀的觀念，一部春秋，就是用微言發揮大義，有時爲了發揮他們擁護等級服從的思想，甚至歪曲或塗滅歷史事實。例如「春秋」上把晉文公召見周天子的史實寫成「天子狩於河陽」；又如春秋二百四十年間，魯國的君主被他的臣下殺害的前後四人（隱、閔、子般、子惡），被殺害於外者一人（桓），而「春秋」沒有紀錄，爲的是要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魯之君臣未嘗相弑」（「禮

記「明堂位」）。像這樣的情形，簡直是把歷史當作歷史家主觀觀念的註腳。不僅「春秋」的作者如此，其他古代的歷史家大半也是爲了發揮自己的主觀觀念，寫成他們的「一家之言」。

因此，中國的古典歷史著作幾乎都貫串着唯心論的觀點。在這些歷史著作中，對於任何歷史事變，都不聯繫到當時的社會經濟去給以說明，總是把這些歷史事變歸結於「卓越人物」的願望。一部二十四史，其中觸目驚心的巨像就是皇帝聖人和英雄。在古代歷史家看來，一部中國史，好像沒有甚麼現實的東西，如果也有歷史的現實，那就是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程、朱、陸、王等相傳的道統，和秦皇、漢武以次的聖君賢相的企圖。一言以蔽之，就是這些「卓越人物」的觀念。

這種觀念的系統，近代的唯心論者稱之曰「知識線」。他們以爲歷史上存在和發展的就是這條「知識線」。至於其他具體的歷史事實，如經濟生活，政治體制，都不過是觀念的體現。因此唯心論的歷史家一致強調歷史上的「卓越人物」，好像任何歷史事件都是按照「卓越人物」的願望而實現出來的。例如西漢之遠征西域，就是因爲漢武帝好大喜功；鄭和之七下西洋，就是因爲明成祖要追捕建文帝；王莽改制，就是因爲他想移漢祚；王安石變法，就是因爲他急功好利；總之，他們以爲不管在甚麼條件之下，「卓越人物」要想創造怎樣的歷史，就可創造怎樣的歷史。換言之，「卓越人物」的觀念是推動歷史發展的唯一動力。

唯心論者不僅把歷史發展的動力歸結爲「卓越人物」的願望，又把「卓越人物」的願望歸結爲神的啓示。貫徹着中國歷史學中的天命論，便是唯心論的最高的發展。照天命論者說來，「卓越人物」的任何想法，都是神的授意。神怎樣授意於「卓越人物」呢？那就是通過讖緯、符瑞等等的暗示。司馬遷說他的寫「史記」，一方面是爲了通古今之變，另一方面是爲了究天人之際。這樣說來，人類歷史的最終極的動力，不存在於人類社會，而是要從神的啓示中去尋找了。

這樣的看法，當然是不正確的。應用唯物論的觀點來研究中國歷史，我們首先就應該從中國歷史上撕去神秘主義的外衣，揭穿唯心論者的階級本質，正確地指出中國歷史發展的動力，不是「卓越人物」的願望，更不是神的啓示，而是社會經濟。社會經濟的結構是歷史的真實基礎，歷史上各時期的政治、法律、宗教、哲學及其他觀念，歸根到底都應該由社會經濟來說明，因爲政治、法律、宗教、哲學及其他觀念都是社會經濟的派生物，只要社會經濟一有變動，他們或遲或早都要跟着變動。社會經濟決定歷史的發展，也決定它的轉變。因此，我們研究歷史，就應該把歷史的動力歸結於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歸結於生產這些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方式，即歸結於社會經濟。

歷史的發展，歸根到底雖然是社會經濟演着決定的作用，但這不是說觀念就毫無作用。唯物論者從來不忽視觀念形態對歷史所起的反作用，而且以爲只有把握了社會經濟基礎與觀念形態之間的關聯與統一，才能理解歷史上的社會之有機的構成。因此，我們研究中國歷史，也要根據物質的實踐

去說明觀念形態，並且從觀念形態中去尋找社會經濟的反射。

其次，中國歷史學上也貫徹着進化論的觀點。所謂進化論，就是以爲歷史的發展，只是和平的漸次的進化，即只有量的積累，沒有質的突變。在進化論者看來，中國的歷史就是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這樣一代一代地因襲下去，古往今來，只有王朝的更替，社會的本質並沒有什麼根本的變革。因此過去的歷史家，他們都是斷代爲史，從來不提到歷史階段問題。

具體的中國歷史已經證明了進化論的觀點是不正確的，因爲中國的歷史也通過了一系列的歷史階段，由原始共產社會而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現在又進入了新民主主義社會。這些相續繼起的社會，雖然也有因襲的關係，但在本質上却是性質不同的社會，而且從一個社會到另一個社會，不是和平的進化，而是歷史的突變、歷史的飛躍。因此，我們研究中國歷史，就要根據具體的歷史資料，劃分歷史階段，就要說明每一個歷史階段的社會經濟構造和它的政治制度乃至意識形態的特點，就要說明從一個歷史階段發展到另一個歷史階段的變革過程。

此外，在中國歷史學中也貫徹着一種循環的觀點。孟子說：「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司馬遷說：「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這些說法，幾乎成了過去中國歷史家共同的觀點。自從鄭衍五德終始之說應用於中國歷史學上以後，歷史循環論更加定型化了。所謂五德，即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別稱；所謂五德終始，就是五行循環。照過去的歷史家說，每一個王朝皆以五行之一爲德

而王，中國的歷史就是按照五行相生、相剋的秩序終而復始地打圈子，打了第一個圈子，再打第二個圈子，這樣一直循環下去。換言之，中國的歷史是不斷地回到它的出發點。

我們必須指出，歷史的發展決不是採取循環的道路，它是一個往前發展的過程，這個往前發展的過程，不是一個圓圈，而是一個永遠不回到出發點的螺旋紋。雖然在中國歷史的發展中，也有些局部的暫時的倒退現象，但整個的中國歷史則是前進的。雖然在中國史上也有些類似重複的現象，但這些類似重複的現象，是在不同的歷史基礎之上出現的。因此，我們研究中國歷史，就不應該誇大某些暫時性的倒退現象，或者類似重複的現象，而是應該從千頭萬緒的複雜史實中，去揭示那條通過曲折歪斜的但始終是向前發展的道路。

最後說到方法問題。

這裏所謂方法，是指辯證唯物論而言。在這裏，我要說到的，是怎樣應用這個方法來研究具體的中國歷史。

用辯證唯物論的方法來研究中國歷史，和用其他的方法研究中國歷史的基本不同之點，就是他的目的不僅是說明歷史，而且是改變歷史。

由於基本的出發點不同，由此屬隔的研究方法也就不同。首先就表現在它不把歷史的研究停止在史料的搜集分類，而是要分析史料，從史料的分析中總結出歷史的原理原則，用這種原理原則

再投入現實的歷史，作為無產階級戰鬥的精神武器。

過去中國的歷史家，以為一個歷史家的任務，就在於把史料堆積起來，而且以為如果對史料進行分析，好像就是歷史學上的異端。辯證唯物論者也知道搜集史料的工作是研究歷史的基本工作，但不論如何，搜集史料只是替歷史研究準備材料，並不是歷史學的終極目的。因為歷史學的任務，總不能就是編成一些史料彙抄，他應該是一種分析史料的科學。如果只是搜集一大塊史料，而沒有能力進行分析，那麼，這樣的史料，除了表示歷史家的辛苦以外，任何用處也沒有。用列寧的話說：「只能等於玩具，或者比玩具更不如的東西。」

因此，用辯證唯物論的方法研究中國歷史，就應該學會分析史料，把史料變成歷史。

和其他的方法不同，辯證唯物論者不把他的歷史研究停止在個別問題的吹噓上，而是要把個別問題當作歷史總體中的一個細胞或環節來研究，看出個別問題在歷史總體中所佔的比重，所起的作用，所能體現的歷史內容或傾向。

過去中國的歷史家，他們放着許多震撼中國歷史的大事變不聞不問，專門從中國歷史上選出一些最偏僻、最微細，亦即最不關重要、最不能特徵歷史傾向的一些問題，把他們孤立起來，大吹大擂，好像一個歷史家的任務，就在於吹噓和玩弄這些個別問題，就在於迴避歷史的重要關鍵，拒絕對歷史的全面研究。

辯證唯物論者並不反對把個別問題從歷史的大聯繫中抽出來，作精細而深入的研究；反之，他提倡這樣的研究，因為研究愈精細，則由此而作出來的總結，也就愈益正確。但是他以為這種被選出的個別問題，必須是一種足以體現歷史發展的傾向，最少也是足以說明歷史的某一側面的那種問題。而且他以為即使是研究個別問題，也不要割斷這個問題與歷史總體的聯繫。因為任何個別的历史問題，如果從歷史的大聯繫中孤立出來，就無法說明。

因此，用辯證唯物論來研究中國歷史，就應該學會怎樣把個別問題的研究，聯繫到中國歷史全面的發展。

和其他的方法不同，辯證唯物論者不把他的歷史研究停止在歷史的表面，如政治現象和意識形態；而是要從歷史的表面現象的背後去發掘構成這些表面現象的基本東西——經濟結構，再用這種基本的東西去說明表面的現象。

過去的中國歷史家，以為歷史學的任務，就在於毫無遺漏地記述這些歷史上的表面現象，如內亂、外患、黨爭、哲學、文學、藝術等等。至於這些表面現象怎樣發生、發展，那好像就不是歷史學應該回答的問題。換言之，他們以為歷史學的任務，只是報告歷史怎樣演變，並不說明歷史為甚麼要這樣演變。

辯證唯物論者以為歷史學的主要任務，不僅是要報告「怎麼樣」，而且要說明「為什麼」。因此